



聆听大师的内心独白

叶赛宁书信集

[俄] 叶赛宁 / 著
顾蕴璞 / 译

Yevgeny Yezhov

名人传世信札
大师私人语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聆听大师的内心独白



叶赛宁书信集

[俄] 叶赛宁 / 著
顾蕴璞 / 译

Семин Леонид

名人传世信札
大师私人话语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叶赛宁书信集/(俄罗斯)叶赛宁著;顾蕴璞译

—北京: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17.10

(名人传世信札/金惠敏主编)

ISBN 978-7-5158-2285-3

I. ①叶… II. ①叶… ②顾… III. ①叶塞宁(

Yesenin, Sergei Alexandrovich 1895-1925) —书信集

IV. ①K835.1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00965号

叶赛宁书信集

作者:[俄罗斯]叶赛宁

译者:顾蕴璞

责任编辑:李瑛 袁一鸣

装帧设计:北京东方视点数据技术有限公司

责任审读:李征

责任印制:迈致红

出版发行: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印刷:北京彩虹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版次:2018年8月第1版

印次:2018年8月第1次印刷

开本:787mm×1092mm 1/32

字数:190千字

印张:12

书号:ISBN 978-7-5158-2285-3

定价:48.00元

服务热线:010-58301130

销售热线:010-58302813

地址邮编:北京市西城区西环广场A座

19-20层,100044

http://www.chgslcbs.cn

E-mail: cicap1202@sina.com(营销中心)

E-mail: gslzbs@sina.com(总编室)

工商联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凡本社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务部联系。

联系电话:010-58302915

总 序

金惠敏

从来就有一个私语的世界，只要您认可人是社会性的动物。私人性与社会性永远相反而相成。

然而由于传统的宏大叙述的霸权，这一世界尚未充分展露，这种话语尚未得到足够的承认。今天，该是打破宏大叙述一统天下的时候了。无论从哪方面说，私人话语都具有与公众话语同等的重要性。而且在某种意义上，私人话语甚至更具决定性或优先性。

例如，如果把阅读和批评作为对另一个心灵的探问，与它碰撞、对话、交流，那么可能没有比通过书信（包括日记）等这类被宏大叙述视为次文本更捷径的方式了。在所谓的正文本即通常所称的作品中，原作者之意盖不在表现，而在表演，即是说，在伪装自己，至少不是在直接地表现自己。如俄国形式主义者所发现的，“文学性即是陌生化”，即以造成

某种接受障碍为美、为艺术或学术。现代主义大诗人艾略特因而特别宣称：“诗不是表现情感，而是逃避情感。”面对公众读者，作者总是代表“理性”“良知”“社会责任”在说话；他总是把自己作为对象，耿耿于怎样给公众塑造一个完美的形象。而在书信中情况就完全不同了，由于面对的是亲朋好友，作者卸下了一切社会性面具，轻松随意地袒露出自己的本真面目。他是纯粹的主体，专注于倾诉，而不是把自己当成一件有待完成的艺术品。这里不需要精雕细刻、深思熟虑。

德国生命哲学家齐美尔断言：“生命并非完全是社会性的。”与其差不多同时代的弗洛伊德把人的心灵划分为意识与潜意识。这里如果把作者的正文本比作意识，那么其次文本即书信等则是潜意识。而潜意识是水面下的冰山，要比显露出来的那部分巨大得多。要深入一个心灵的世界，仅知其正文本最多只是完成了一半的工作，而只有同时了解了他的次文本，才可能真正地把握这位作者。因此，美国现象学批评家有理由认为，对于游历一位伟大的心灵来说，书信、日记、便条、眉批、笔记等的作用绝不亚于其刻意创作出来的作品。

通过这一书系，我们试图证明书信具有独立的价值：它是抒情的、亲切的美文；它是作者内在的精神世界和情感世界的自然袒露；它是人类一种特殊的情感方式和审美方式。

简言之，我们的目的是培养一种与公众性阅读相辉映的私密性阅读。

为方便查阅，丛书在每封信前都加有提示性标题，或为作者原话，或为编译者的概括。

是为序。

译者序

顾蕴璞

谢尔盖·亚历山德罗维奇·叶赛宁(1895—1925),只是在死后半个世纪才被追认为苏联诗歌奠基人之一和苏联两大诗歌传统的主要代表之一(另一人是马雅可夫斯基)的。苏联解体后,叶赛宁作为“民族诗人”的地位随着俄罗斯单独成国而更为突出。叶赛宁对俄罗斯大自然的亲近,对俄罗斯(尤其在俄罗斯农民这一层面上)命运的关注,对俄罗斯文化的洞悉,对俄罗斯语言的锤炼,经过时间的证实,已使今天的俄罗斯人对于20世纪20年代高尔基所给予他的“伟大的民族诗人”的评价有了共识。

叶赛宁于1895年9月21日(公历10月4日)出生在俄罗斯中部美丽的奥卡河畔梁赞省梁赞县康斯坦丁诺沃村的一个农民家里。13岁以前,叶赛宁在富裕的外祖父季托夫家度过了童年和少年,受到博闻强记、知书识理、善讲古老传说、

爱唱民歌的外祖父的深刻影响。在外祖父家和整个乡村民间文学的氛围里，在美丽的自然和悠远的传统的背景上，叶赛宁的心田里早早地孕育起了诗的种子。他常常沉湎在充满诗情画意的乡野，耽于幻想与梦境，向往古老罗斯田园牧歌式的人间天堂。1909年，叶赛宁入斯巴斯—克列皮克教会师范学校就学。1910—1912年，他初露诗才的锋芒，写出像《湖面上织就朝霞的锦衣……》、《稠李花飞似雪片飞舞……》等咏唱美丽的家乡田野的清新迷人的诗来。1912年从教会师范学校毕业后，他只身去莫斯科当店员的父亲处，当了一阵子店员，因不愿伺候老板娘而还乡。1913年，再次去莫斯科，任一家印刷厂的助理校对员，业余参加苏里科夫文学与音乐小组，常在工人中散发传单，参加工人的集会，遭到过警方的搜查和盯梢。由于深感自己文化素养不足，叶赛宁进入沙尼亚夫斯基人民大学，补修哲学、历史等课程。他的诗创作热情进一步高涨，但反映城市现实的兴趣很快由对家乡和童年的回忆所取代。身居城市而心驰乡村，叶赛宁以一种在别离后备觉珍贵的心情写出许多夺人心魄的优美抒情诗而使城市的文艺沙龙刮目相看。娉婷的白桦、芬芳的麦穗、欢唱的溪水、镀金的针叶都谛听着诗人那颗恋乡爱国的赤子心的声音：“假如天国朝我喊叫：‘快抛开俄罗斯，住进天国！’ /

我定要说：‘天国我不要， / 只须留给我自己的祖国。’”（《你多美，我亲爱的俄罗斯……》）

1915年，叶赛宁由莫斯科专程去彼得格勒（1924年起更名为列宁格勒）求见大诗人勃洛克，受到热情的接见。勃洛克听了他的诵诗后称他为“才气横溢的农民诗人”。从此，在师法勃洛克的抒情技巧和得益于他举荐的优越条件下，叶赛宁很快成为闻名全俄的抒情诗人。1916年，叶赛宁应征入伍，在皇村服役，直至1917年二月革命才离开军队。同年，他的第一部诗集《亡灵节》问世。书中除通过神灵故事探索生活哲理的崇神或渎神的诗外，主要是些色彩绚丽的、充溢拟人拟物的景物诗或乡愁诗，营造拟人于物或拟物于人的境界：拖着绿色发辮、穿着白短裙的白桦，开腔说话的金色树林，羞红了脸的花楸，思量着嫣红黄昏的大路，张着火红的翅膀的晚霞，跳舞又哭泣的春雨，老是打着盹的原始森林，用犄角触着白云的月亮，摇晃着两岸的河水，温情脉脉地望着人们的星辰，悄悄徘徊在玻璃窗上的点点秋雨等等。

叶赛宁不仅善于从大自然中捕捉美，而且注意从俄罗斯的文化精神和道德审美理想中开掘诗泉。如1912年写就的叙事诗《叶甫巴季·柯洛弗拉特之歌》，歌颂了一位抗击鞑靼侵略军、奋战到最后一息的俄罗斯民族英雄。这类叙事诗，与

咏唱家乡与大自然的抒情诗在风格上迥异，字里行间闪耀的已不是月光花影，而是刀光剑影。同时，对乡村古老传统的向往和对世风日下的现实的失望在他心中更萌生了“农民的天堂”的幻想。他把1917年二月革命视为对人间的一次新的洗礼（小叙事诗《悠扬的召唤》，1917），认为建立“农民的天堂”，“使普天下和解”的时代终于来临（小叙事诗《八重赞美诗》，1917；《决裂》，1917），又以“农民的天堂”即将如愿以偿的心情，讴歌了十月革命（小叙事诗《变容节》，1917；《乐土》，1918；《约旦河的鸽子》，《天上的鼓手》，1918，等）。诗人受自己心中的“农民的天堂”的理想的魅惑，滋生出在对旧世纪之恨的驱使下以人取代神的激情来：“我要在圣像上用舌头舔去／殉教者和圣徒们的面影，／我答应给你们一个乐土城，／里面住着活人们的神灵。”（《乐土》，1918）

对于一位自己的思维一时一刻离不开田园的农民诗人来说，没有比大同世界的理想更令人梦萦魂牵的了。诗人喊出了：“天上的星斗如纷纷落叶，／汇入我们旷野的江河流去，／啊，天上和人间的／革命万岁！”（《天上的鼓手》）。“天穹像一口大钟，／月亮是它的钟舌，／我的母亲是祖国，／我是布尔什维克。”（《约旦河的鸽子》）

但叶赛宁自己也承认：革命年代我全部身心都在十月革命一边，然而我是按自己的理解，带着农民的倾向来接受一切的。^①残酷的阶级斗争惊醒了他“使普天下和解”的美梦，从城里来的不速客“铁的客人”给了他乡村将蒙难的不祥预感，于是不禁哀哭起“铁马已战胜活马”（《四句祭》，1920），悲叹起灵感之树的枯萎（《我是乡村最后一个诗人》，1919）。从革命激情的云端堕入“精神危机”深渊的叶赛宁，在惆怅之余开始与文坛一些风流名士结交，出没于莫斯科的小酒馆，借酒浇愁，吟诗谴闷，这就是通过变态的爱情宣泄表现诗人在城乡关系上的迷惘之情的组诗《莫斯科酒馆之音》的由来。但即使在迷误时诗人也不失为忧国忧民的爱国诗人。如他在《无赖汉》一诗中深情地唱道：“我的罗斯，木头的罗斯啊！/我是你唯一的代言人和歌手。/我用木犀草和薄荷喂养过/我那兽性的诗篇中的烦忧。”

对城乡关系认识上的偏颇扭曲了诗人的心灵，使他成为一个因心爱的“乡村罗斯”的逝去而无奈、无望和无情的无赖汉形象。但作为乡村象征的泥罐子在城市这个铁罐子上碰得粉碎。无情的历史一度扭曲了他的思维方式（用颓唐向城

^① 叶赛宁：《自叙》，载《叶赛宁评价及诗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5页。

市报复)，但并不能中止他对乡村罗斯的探索。他在创作萎靡的《莫斯科酒馆之音》（1919—1923）的同时，写出了《普加乔夫》（1921）这部风格遒劲豪放的诗剧，开掘了普加乔夫这个悲剧形象的内心积淀，从历史的角度继续探索农民在革命中的历史命运，并在被举为意象派领袖的条件下大胆探索意象美，引起了一些人对他诗中意象过于密集的非议。

上世纪20年代初，苏联国内新经济政策的胜利，在新的基础上巩固了城乡关系，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也消除了叶赛宁对城乡关系一度存在过的疑虑。1922年至1923年间，诗人和他新婚的妻子美国舞蹈家邓肯历时一年余的欧美五国（德、意、法、比、美）之行，也使叶赛宁感到工业化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他对宗法制的罗斯那种乌托邦的农民天堂渐渐失去了热情，准备重新认识工人人们的天堂。他在《铁的密尔格拉德》（1923）这篇揭露金圆帝国的脓疮的随笔中写道：“从此刻起，我再也不爱贫穷的俄罗斯……从这天起，我更加热爱共产主义建设了。”

1923—1925年，是叶赛宁思想发生变化后创作热情高涨的时期，他以悔恨的心情和急起直追的姿态，写下了大量直接反映新生活的优秀诗篇，如描写抗击尤登尼奇匪帮，保卫彼得格勒的英勇战斗的叙事诗《伟大进军之歌》（1924），歌

颂为苏维埃政权牺牲的巴库政治委员们的英勇业绩的叙事诗《二十六人之歌》(1924), 讴歌为反对沙皇专制而遭流放的政治犯的叙事诗《三十六个》(1924), 未完成的以歌颂列宁为主题的叙事诗《风滚草》的片断《列宁》, 以及成为诗人最主要的代表作的叙事诗《安娜·斯涅金娜》(1925) 等。这部作品描绘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二月革命、十月革命、国内战争、农村社会主义改造等各个历史阶段的壮阔画面。长诗所描写的故事, 是诗人 1917—1918 年间几次回自己家乡康斯坦丁诺沃的所见和所闻(略加想象), 几个主要人物都可在现实生活中找到原型, 如地主小姐安娜·斯涅金娜, 取自女庄园主莉季娅·伊万诺夫娜·卡申娜, 即抒情诗《绿茸茸的秀发》一诗中所提到的那个少女, 但她并未如长诗中所写逃亡英国。本诗以抒情与叙事平行交织和以侧面落笔的新型手法, 在苏联诗歌中首次探索了农民在社会主义革命中的历史命运, 成功地塑造了普隆·奥格洛勃林这个最早出现于苏联诗歌中的农民革命家形象, 成为诗人毕生探索俄罗斯农民的历史命运的巅峰之作。这部作品站在历史的高度, 怀着对真理的信念, 大胆地将一名逃亡异国的地主小姐作为主角, 并描绘了革命使她心向祖国的威力: “我常常到码头上, / 不知是高兴还是恐惧, / 我在各国的船舰中间, / 越来越关注苏维埃的红

旗……”

在抒情诗方面，这两年诗人共写了一百多首，几乎是字字珠玑，首首出众，如《回乡行》（1924）、《苏维埃罗斯》（1924）、《斯坦司》（1924）、《大地的船长》（1925）、《给一个女人的信》（1924）、《给外祖父的信》（1924）和《昏黄的淡月临照当头》（1925）、《波斯抒情》（1924—1925）等，特别是《波斯抒情》这部将祖国、爱情、大自然和诗人的使命等多种主题融为一体的抒情组诗，是叶赛宁一生抒情诗成就的总结，是俄罗斯诗歌史上一颗永闪异彩的明珠。全组诗中15首各具特色，又相映成趣，共同造成一个异国多姣，不如家乡可爱、美人令人销魂，但祖国更使人动情的迷人意境。诗人为整个组诗注入了一个艺术家对美的景、美的情的追求，一个诗人对时代的责任感和一个公民对社会主义祖国的自豪感。艺术上更是声情并茂，凡中见奇，攀登或超越了古典抒情诗的艺术高度。

由于新旧交替的历史转折所形成的种种复杂矛盾和由此而引起的个人生活中几次恋爱悲剧，诗人的创作道路上始终是荆棘丛生，布满坎坷，甚至在写作富有革命热情的作品的同时，仍不时在诗篇中流露出悲观绝望的情绪来。在多首晚期抒情诗中诗人想到了死，在长诗《黑影人》（1925）中，诗

人用黑影人这个意象物化了当时主宰他的矛盾心态：使他身陷困境者的象征黑影人时时处处缠着诗人，诗人想用拐杖痛打他，结果他把镜子打碎了。诗人用象征手法向人民暗示：要摆脱绝境，就必须自我毁灭。1925年12月27日，叶赛宁在精神抑郁症发作下自缢于列宁格勒一家旅馆，当时还不满30周岁。近年来，不断有人认为叶赛宁并非死于自杀，而是亡于他杀，理由是他的创作与言论背离并干扰了当政者的方针，但至今评论界尚未正式更改原有的结论。但就我所译叶赛宁书信含有的某些信息在我身上所产生的直感而言，新的结论更符合生活的逻辑。

叶赛宁是俄罗斯的乡村诗人，是俄罗斯的民族诗人，也是俄罗斯的悲剧诗人。叶赛宁的悲剧，不仅仅是他个人的悲剧，更重要的是乡村与城市关系处理上的悲剧，是传统文化与现实政治关系处理上的悲剧，带有鲜明的时代烙印，对后世各国文学艺术的发展都具有借鉴作用。

叶赛宁毕生忠实于俄罗斯的民族传统，他的审美理想始终与俄罗斯的乡村、传统以及生态环境密不可分。俄罗斯乡村的枯荣、文化传统的兴衰，自然环境的变革时刻在左右着叶赛宁的诗创作灵感。由革命引起的在乡村及大自然方面的动荡变化招致了诗人一生的坎坷，造成他的悲剧归宿，赋予

他的诗以一种忧伤的情调和悲剧的韵味。

叶赛宁的诗歌植根于俄罗斯民族的土壤，他通过形象的创造反映俄罗斯的历史和心灵，又从研究民间形象的创造来提高自己的艺术形象的民族特质。他在谈到日常生活中的形象象征（毛巾上的绣花，屋顶上的小马，百叶窗上的公鸡等）时说，“这是一部关于世界的出路和人类的使命的伟大的历史性史诗。”^①他又说，“我们的音乐和史诗是借助树木的符号而共同产生的。”^②“一切都起源于树木，这就是我国人民的思想宗教。”^③由此，不难理解，为何树木等自然意象在叶诗的形象宝库中占如此重要的位置，为何叶赛宁的形象性与音乐性能够如此水乳交融在一起。他通过对民歌和古典诗歌的研究得出结论说，“艺术家使词与词之间产生某种和谐，即词进入一个或多或少地相近的发音领域”。评论界赞扬叶赛宁在音乐性方面的突出成就说，“这种高超的艺术技巧，我们继普希金之后，也称之为莫扎特音乐般的精粹，莫扎特音乐般的令人着迷之物。”^④

① 叶赛宁：《玛丽亚的钥匙》，《国际诗坛》，漓江出版社，第3辑，第200页。

② 同上，第200页。

③ 同上，第199页。

④ 普罗库舍夫：《谢尔盖·叶赛宁（形象·诗与时代）》，《叶赛宁评介与诗选》，第77页。

但是在新旧交替的年代里，叶赛宁基于民族诗歌传统在人与自然一体方面的艺术探索以及由此而派生出的认为革命的改造有违自然的本性的一时迷误，始终被许多人认为是守旧或复古，是对新生活的反动。即使在叶赛宁去世之后，他的诗歌遗产仍长期被当作时代的落伍者的产物而遭到埋没。但诗人在生前并不屈服于任何压力，他在《波斯抒情》这部抒情诗杰作中表述了诗既要言志又贵创新，即既要与时代同步又要保持诗人自己在艺术上的独特追求的美学思想：“做一个诗人，就要歌唱自由，/让自由的美名广泛地传扬。/夜莺歌唱，他不觉得难过，/他在把同一只歌吟唱。/金丝雀唱的是别人的声音，/它是可笑又可怜的小铃铛。/世界需要语言的歌吟，/独特得哪怕跟蛙鸣一样。”他在《致普希金》一诗中把自己的艺术探索与对普希金的民族传统的继承视为一体：“虽然命定要受到排挤，/但我还将久久地歌唱……/好让我的草原之歌，/也能像青铜一样铿锵。”因为，诗人的抒情诗不但洋溢着对祖国和人民的感情，而且充满对大自然的感情的感情，他的“草原之歌”定将像普希金的长诗《青铜骑士》一样万古流芳，永远在俄罗斯保持新鲜的艺术魅力。今天看来，叶赛宁歌唱自然的诗篇的艺术价值甚至超过了他歌唱革命的诗篇，请看他是多么富有保护生态环境的天才预感啊：“啊，